

批判“四人帮”篡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反动谬论

陈 征 骆焉名 曲 平

0-08

福 建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批判“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反动谬论

陈 征 骆焉名 曲 平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33/8印张 72千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统一书号：3173·255 定价：0.25元

前 言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批判，粉碎他们的反动思想体系，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这是我们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理论战线长期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①“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②也是我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既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又是指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当然要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经过“四人帮”一伙的精心策划，一九七一年，张春桥就亲自批准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内成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组，责令“搞出一本反映我们水平的教科书。”他的余党还向人交底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这就是说，这本书制造的反动谬论，是为他们反革命政治纲领和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提供理论

①《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页。

②同上书，第41页。

根据的，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篡党夺权也就“有理”了，也就“好办”了。因此，他们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抱着很大希望”。马天水亲自主持了第一次的编写组会议。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召开座谈会，不断发出黑指示，用所谓“张春桥思想”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先后写出五稿，乘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抓紧出书，以密切配合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四人帮”还通过他们的舆论喉舌，如梁效、池恒、康立、方海之流，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大肆宣扬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动谬论，一时间，群魔乱舞，一片乌鸦噪叫声充满了理论阵地。

他们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基本任务”规定为“分析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他们用历史唯心论冒充历史唯物论，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篡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基础；

他们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制造出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胡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他们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硬说它们是“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反对利用价值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他们鼓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他们在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拼凑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以资产阶级法权为中心，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为出发点，以

社会主义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理论根据，以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个反动理论体系，必须彻底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

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我们理论工作者深受其害。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妖魔扫尽，人心大快。“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被彻底砸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贯彻，为学习、宣传、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出于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恨，编写了这本小册子，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歪曲和篡改，驳斥他们在这方面的主要的反动谬论，从理论上划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肃清其流毒。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学习得很不够；加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在今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解决，因而这本小册子的错误和缺点一定很多，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目 录

前 言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不容篡改·····	(1)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根本否定·····	(16)
不许丑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24)
彻底批判诋毁按劳分配的反动谬论·····	(41)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61)
一定要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77)
对社会主义再生产原理的可耻歪曲·····	(90)
结束语·····	(99)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不容篡改

资产阶级学者、新老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要极力攻击和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篡改，首先也是从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开始的。为了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经济理论，就要首先揭露、批判他们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方面的反动谬论。

围绕着政治经济学对象和任务的斗争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建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时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到《资本论》研究对象时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①在谈到研究的目的时他又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革命结论。恩格斯明确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① 他给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② 并指出，当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弊病的经济根源，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从物质生活中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已明确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它的任务和目的是揭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这是和它的研究对象密切联系的。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③ 正因为这样，所以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以来，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千方百计地极力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以及德国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统一，给反动统治者造成很大威胁。这时候，机会主义者杜林就公开跳出来，抄袭加拚凑地抛出了他的反动思想体系，全面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企图造成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混乱，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上，公开进行歪曲和篡改。杜林胡说什么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① 并企图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立所谓“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杜林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把交换和生产混为一谈；他还把分配看作是和生产毫不相干的过程，企图把分配理论从经济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去。为了批判杜林的机会主义反动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及时写了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反杜林论》，对杜林的反动思想体系给予毁灭性的批判。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章中，专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生产、交换、分配的相互关系；阐述了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② 批判了杜林“把经济学归结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③ 的谬论，指出杜林的反动目的在于：把经济规律说成是自然规律，从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同自然规律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以便长期保持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十九世纪末，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工农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192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③ 同上书第191页。

的革命要求逐步高涨，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民主革命走向高潮。这时候，民粹派分子竭力维护富农的利益，同沙皇制度妥协，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对象上大做文章。“他们认为应该把‘消费’当作特殊的科学部门而同‘生产’分开；他们说生产以自然规律为转移，而消费决定于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分配”。^①他们一方面把经济规律当作自然规律，企图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另一方面，把分配提到首位，宣扬分配决定论，企图把革命限制在仅仅为改善经济生活而斗争的范围内。为了粉碎民粹派在经济学上的反动谬论，列宁在极其困难而艰苦的条件下，写了《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列宁指出：“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还指出：“如果我们一贯把‘生产’看做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如果生产中的关系阐明了，各个阶级获得的产品份额也就清楚了，因而，‘分配’和‘消费’也就清楚了。相反地，如果生产关系没有阐明（例如，不了解整个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关于消费和分配的任何论断都会变成废话，或者变成天真的浪漫主义的愿望。”^②列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和消费、分配关系的精辟分析，打中了分配决定论的要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科学性。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9页。

② 同上书第69—70页。

义政治经济学作指导。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为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反党分子布哈林就胡说什么：“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这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政治经济学也必定消灭。他还说：“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则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问题’，就都消失了。”布哈林所说的“无组织的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有组织的社会”，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只能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布哈林妄图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动企图，当时就受到列宁的严肃批判（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围绕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又开展了新的论争。在一九五一年苏联经济问题讨论会上，雅罗申柯就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他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①他认为：每一社会形态只有它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否认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雅罗申柯的错误观点，实质上是为了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他是在保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义下，通过改变其研究对象来达到这一目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雅罗

① 转引自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7页。

申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斯大林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① 斯大林批判了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一部分的荒谬观点，指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国民经济计划化，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由此作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日常工作。”如果“把经济政策的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② 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具体阐述，有力地批判了以雅罗申柯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修正主义篡夺了苏共党的领导，苏联从社会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起来，一些修正主义的辩护士，竟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已经消灭，矛盾也不存在。他们企图把政治经济学篡改为研究生产技术方面的内容。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林彪、陈伯达一伙，妄图取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否定按劳分配。面对着国内外修正主义的反动叫嚣，马克思主义者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新的战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毛主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关系。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

①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

的经济问题。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商品交换，分配制度，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的髙速度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问题，都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理论概括，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作出了杰出的划时代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和创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始，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纯洁性；特别是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对象和任务的科学规定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中，创建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

“四人帮”是如何篡改 政治经济学对象的？

“四人帮”是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新老反革命分子，同历史上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一样，他们反对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总是要极力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他们在上海炮制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首先从篡改政治经济学对象、任务入手，从而拼凑其反动理论体系的。

“四人帮”打着“一分为二”的幌子，杜撰了一个“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二因素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①而“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②并抓住这个“资产阶级法权”大做文章，按照张春桥“论全面专政”那篇黑文的口径，宣称“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③还进一步发挥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④“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⑤因此，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⑥

经过这么一番编造和推论，资产阶级权利身价十倍，被推上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地位，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这样，他们就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篡改为资产阶级权利。“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按照这样确定的对象来拼凑、构筑其反动经济理论体系的。全书十五章，洋洋几十万言，资产阶级权利问题充斥于各个章节，成为中心内容而贯串于全书。这本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

①②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76年版第485—486页。

③ 同上书第79页。

④ 同上书第443页。

⑤ 同上书第411页。

⑥ 同上书第382页。

乃是“资产阶级权利政治经济学”。

“四人帮”对政治经济学对象进行这种明目张胆的篡改，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正如上面已经阐述的，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明确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只能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明确认为，社会的权利关系，是意志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① 资产阶级权利，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权利关系，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发了那么多的议论，但是从来不敢明确讲清它的含义，故意搞得神乎其神，他们肆意混淆经济关系和权利关系的界限，离开经济关系的客观现实，对资产阶级权利予以各种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极左叫嚣来取代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总之，他们从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理论基础出发，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生产关系偷换为资产阶级权利，从经济关系转移到上层建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其严重的篡改。

其次，权利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从来不占重要地位，权利关系只有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才能得到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① 权利关系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只有研究了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这一社会的权利关系才能得到说明。因此，正如一篇根据恩格斯的指示写的文章中所说的：“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律上的权利（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②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经济关系和“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的错误时，指出：“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③ 可见，如果把“法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那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理论颠倒。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它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部分资产阶级权利。但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它不仅在内容、性质和作用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它的范围也大大缩小了，正如列宁所说的只是“一小块”；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三大差别的缩小、和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小部分资产阶级权利，也将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因此，资产阶级权利不仅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且也不能作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2页。

“四人帮”“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那么，“四人帮”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把资产阶级权利作为他们经济理论的中心呢？这完全是由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基本任务”所决定的，进而言之，这完全出于为其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和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需要。

一九七六年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四人帮”急于发难，公开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三月，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对他们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就修改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门下达了一个黑批示，写道：“要批修。批刘、林、△，批托、布等。不批修，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好的。要知道，斯大林错误的东西影响是不小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①御用写作组对这个假批修、真反党的黑批示心领神会，在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五稿修改中，加以全面的贯彻，按照黑批示的精神，大肆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这本书的“序言”开宗明义宣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行（到）社会主义

^① 张春桥1976年3月22日在上海市委写作组1976年选题计划上的批语。